

目 录

1. 概论	1
1.1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势	1
1.2 外语类专业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3
1.3 振兴外语类本科专业的基本路径	5
2. 专业定位	13
2.1 新时代外语类专业定位的必要性	13
2.2 存在的问题	14
2.3 新时代外语类专业定位	16
3. 复合型外语人才	25
3.1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定义	25
3.2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	26
3.3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7
3.4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9
3.5 法律英语方向人才培养目标	31
3.6 医学英语方向人才培养目标	31
4. 素质要求	33
4.1 人生哲学	33
4.2 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36
4.3 社会责任感	37
4.4 人文与科学素养	38
4.5 合作精神	40

5. 知识要求	41
5.1 外国语言知识	41
5.2 外国文学知识	50
5.3 国别与区域知识	52
5.4 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54
5.5 相关专业知识	60
5.6 跨学科知识结构	61
6. 能力要求	64
6.1 外语运用能力	64
6.2 文学赏析能力	71
6.3 跨文化能力	73
6.4 思辨能力	79
6.5 研究能力	89
6.6 创新能力	93
6.7 信息技术能力	101
6.8 自主学习能力	107
6.9 实践能力	115
7. 课程体系	127
7.1 总体框架	127
7.2 课程结构	133
8. 培养方向课程	140
8.1 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原则	140
8.2 外国文学方向课程	147
8.3 外国语言学方向课程	150
8.4 翻译学方向课程	155

8.5	外语教育方向课程	156
8.6	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	166
8.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课程	169
8.8	专门用途外语方向课程	177
9.	实践教学	211
9.1	实践教学与实践能力	211
9.2	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	212
9.3	实践教学的形式与课程设置	214
10.	毕业论文	218
10.1	当前外语类专业毕业论文工作存在的问题	218
10.2	外语类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多样化解决方案	221
10.3	毕业论文（设计）多样化的优势	222
10.4	实施建议	223
11.	教师队伍	226
11.1	师资结构	226
11.2	教师素质	228
11.3	教师发展	230
12.	教学条件	240
12.1	教学设施	240
12.2	信息资源	241
12.3	实践教学	242
12.4	教学经费	243

13. 质量管理	245
13.1 教学与评价	245
13.2 质量保障体系	257
14. 国外高校一流外语类专业培养方案特色与启示	270
14.1 英国牛津大学法语专业课程设置	270
14.2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	271
14.3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学专业课程设置	272
14.4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中国学专业课程设置	275
14.5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课程设置	275
14.6 国外高校一流外语类专业的多元能力培养	279
14.7 借鉴	281
15. 国内高校一流外语类专业培养方案分析与评价	285
15.1 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285
15.2 外语类专业课程体系总体要求	286
15.3 《国标》要求落实情况检视	291
15.4 问题与借鉴	304

1.1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势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的二十大（2022年10月）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蓬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要判断高等外语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必要首先厘清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方位。

1.1.1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跃居全球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1489所；成人高等学校253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4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9.6%。按照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评价标准，毛入学率达到50%意味着一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吴岩（2017）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当前形势做了三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上进入世界中上水平，开始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第一方阵；其二，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与国际高等教育最新发展的潮流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标准同频共振；其三，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来说是在追赶与超越、借鉴与自主、跟跑与领跑交织交融，有落后的，有跟跑的，个别还有领跑的。

1.1.2 教育强国战略吹响进军号角

进入 21 世纪，中国已悄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教育大国。在此关键历史节点上，中共十九大报告吹响了建设教育强国的进军号角：“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报告对教育的功能做出了精辟概括：“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必将极大地促进并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1.3 高等教育进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新阶段

面对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赋予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中国高校应如何写好“奋进之笔”？2018 年 10 月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做出了明确回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高等学校必须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振兴本科教育，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奋力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

简言之，振兴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下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攻坚克难的主题。必须全面落实“四个回归”，即回归学生要刻苦读书的常识，回归教师

要教书育人的本分，回归学校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回归教育要报国强国的梦想；通过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和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初步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质量督导评估制度，促进大学质量文化建设。

在促进高校普遍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同时，教育部等六部门还出台了《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要求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强化使命驱动、注重大师引领、创新学习方式、促进科教融合、深化国际合作，选拔培养一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为新时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发展播种火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思想高地奠定人才基础。

1.2 外语类专业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1.2.1 四十多年来外语类专业取得的成就

外语类专业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走向息息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学习俄语，到 60 年代逐步恢复英语专业并建立欧亚非多语种专业，随后的“十年浩劫”让高校外语类专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胡文仲 2011）。70 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外语类专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春天。伴随着 40 多年来整个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外语类专业教育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外语类专业自身的发展来看，全国高校设置外语语种的专业数量稳步增加，从 1966 年的 41 个语种增加到 2021 年的 101 种；各语种专业点的数量和招生规模也迅速增加，原来的英语专业扩展为英语类专业，包括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等平行本科专业。外语类专业 2019 年招生总数已达到 236,360 人。无论从专业点的设置还是从招生规模来看，外语类专业均已成为全国高校最大的专业之一。与此同时，外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层次也逐步健全。自 1981 年国务院批准 5 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和 23 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以来，本科、硕士、博士生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都不断提升，2021 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已经达到 53 个。

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外语类专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外语人才，包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外交外事人才；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对外传播人才；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商贸人才；提高整个高等教育各专业人才国际化

能力的公共外语教师；中小学外语教师；各行各业的翻译人才；提高全民外语能力的各类培训机构的外语教师，等等。可以说，高校外语类专业培养的浩浩荡荡的语言服务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中国顺利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并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全球化时代迅速崛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2.2 外语类专业面临的挑战

必须承认，外语类专业也面临种种挑战。其一，外语类专业点规模过大。这主要表现为英语类专业的迅猛扩张。传统的英语专业近年来扩展为英语、翻译和商务英语三个专业。根据高教司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英语本科专业布点数达到1,021个，翻译专业283个，商务英语专业407个；另外，高职类英语专业还有500多个专业点。英语类本科专业已发展成国内高校最大的本科专业之一，2020年招生数达到16万以上。英语类专业毕业生每年浩浩荡荡涌进容纳有限且随着经济形势波动的就业市场，必然会带来就业率下滑的问题，相应地也会对其生源带来不利影响。

应该看到，外语类专业的就业问题有其结构性特点。非英语类外语专业的就业状况总体比英语类专业更好，英语类专业的三个专业之间的就业率也有差异，一本生源的英语类专业就业率较之二本、三本生源的英语类专业的就业率也不一样，学校排名和所处地域不同也会对就业率产生影响。学界和社会在从就业率角度评价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时，所有这些结构性因素都应该考虑进去，同时还应该把外语类专业和高校其他类专业进行横向比较。总体来看，外语类专业的确应高度重视就业率下滑的问题，但其严重的程度往往被夸大（麦可思研究院2018）。

其二，专业同质化比较严重。外语类专业的同质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办学定位模糊不清，培养目标整齐划一，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趋同，应用型专业和学术型专业难分。英语类专业因为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的派生使同质化程度有所缓解，但很多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有名不副实之嫌，与英语专业的区别并不明显。同质化问题在外语类其他语种专业也普遍存在，如郑书九等（2011）、周媛（2014）和丁超（2018）调查发现，西班牙语、日语和非通用语专业也存在同质化现象。外语类专业的同质化培养，加剧了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本专业更好地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其三，培养能力不足。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能力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和办学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考虑到全国高校外语类专业点的实际状况，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其中，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最为突出，如大量的专业点生师比极不合理，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均达不到最基本的要求，许多教师的语言能力、教学能力、专业素养、科研能力等严重不足。这些问题在不同语种专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刘宏和孙玉华（2018）于2016年—2017年主持的全国俄语专业情况调查所发现的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外语类专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近年来迅速增加的非通用语专业尤为突出（丁超 2017）。所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全国高校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外语类专业的培养能力不足还突出表现为外语类专业毕业生“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尴尬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外语类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掌握了听说读写译基本外语技能的“外语人才”，满足了国家对外开放较低层次的外语人才需求。但是随着中外政治经济交往和中外文化交流进入更高阶段，国家急需大批不仅具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而且真正理解对象国政治经济现状和历史文化传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国际化高层次研究型和应用型外语类专业人才，而外语类专业却未能提供这样的“大才”。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学科观念模糊、专业意识淡漠、偏离专业本位，混淆了英语与英语专业、英语学习与英语专业学习的根本区别，致使英语专业受到严重误解，工具化和功利化观念严重”（查明建 2018）。英语专业的问题在整个外语类专业具有普遍性。

我们必须正视外语类专业所面临的挑战，但又不能妄自菲薄。困扰外语类专业的种种问题，是外语类专业过去40多年高歌猛进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下的普遍性问题，也正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阶段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1.3 振兴外语类本科专业的基本路径

1.3.1 优化外语类专业点布局

伴随着过去40多年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外语类本科专业也在数量上大幅增长。

数量的增长为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带来巨大挑战,教学资源不足,培养质量下滑,就业率下降;而且往往越是教学资源薄弱的地方院校招生规模越大,造成恶性循环。可以说,困扰当前外语类专业特别是英语类专业的主要问题,既有“产品不合格”的问题,也有“产能过剩”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从外延式扩张阶段转向内涵式发展阶段,外语类专业也面临“供给侧”改革问题。

外语类专业的“供给侧”改革将主要通过教育部即将推出的“三级专业认证”来实施。该项计划以《国标》为依据,对全国高校各专业类本科点进行三个等级的评估,即“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保合格”评估不用专家进校,完全基于数据做出分析,看基本办学条件是否达到;“上水平”评估也没有进校考察环节,是在数据基础上请相关专家作定性分析,看专业点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专业建设内容如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是否合适;“追卓越”评估则要安排专家进校考察,做出高水平、国际等效的实质认定(范海林 2018)。

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三级专业认证”的具体实施细则。我们建议,在“合格”或“兜底”层级的评估应非常严格地按标准执行,确保各专业点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如果数据分析显示某高校专业点达不到基本要求,为慎重起见,可安排专家进校核查。对于最终评估为不合格的专业点,要限期整改,或建议相关高校对该专业点进行校内关停并转。对于“卓越”或“一流专业”的认证也应非常审慎,确保为全国高校同类专业点树立学习的榜样,指明前进的方向。对于外语类专业来说,“三级专业认证”是优化专业点布局的有力抓手。

1.3.2 促进外语类专业多元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正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将以“多样化”为典型特征,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学校都可以成为国家队,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如此”(吴岩 2017)。对于全国高校 1,000 多个外语类本科专业点而言,多元化是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时下,关于英语专业如何走出困境,外语界可谓百家争鸣。有主张人文取向的(蒋洪新 2018),有主张复合或“外语+”取向的(姜锋 2018),有主张应用取向的(王立非、崔璨 2018),有主张学术取向的(曲卫国、陈流芳 2018)。其实,每一种主张

都不无理由，但是没有任何一种主张适合全国高校每一个英语专业点。各专业点的办学传统和条件不同，其所在学校的办学定位也有差异，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变化的。这就决定了英语专业的办学必须超越同质化模式，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根据《国标》的定义，“外语类专业是我国高等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按照这一定位，所有外语类专业点必须健全语言、文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三个板块的核心课程，满足所属学科的基本要求。在此共同的学科基础上，不同高校的外语类专业点可以有不同的特色定位。有的专业点可以侧重语言研究，或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重视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和长远发展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学科知识体系；有的专业点可以定位为师范教育，为基础教育培养外语师资；有的专业点可采取“外语+”跨学科模式，培养外语精湛，具有人文素养和某一相关专业（如新闻学、传播学、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贸易、法学，等等）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有的专业点可以将外语教育、人文教育和区域与国别研究融为一体，培养通晓国际规则、善于跨文化沟通、具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体系与相关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组织的人才急需。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理应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深耕细作。有些专业点还可以结合本校特色加强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培育特定专业或行业领域的外语人才。

总之，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对外语类专业的人才需求更加多样化，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3.3 加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

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倡导者，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稳步推进，中国与超级大国美国的竞争和冲突更加激烈，中国与整个发达国家阵营的关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活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着传承创新的挑战。一句话，进入大国外交时代的中国需要在

全球范围内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互动，需要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进行更加复杂和艰巨的斗争，需要积极促进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高校外语类专业培养一代又一代掌握各国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并通晓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外交外事的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

在国际经贸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广泛响应。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五年多来，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国纪平 2018）。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的成功落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也为外语类专业特别是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创造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根据王铭玉（2017）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近60个，如果把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计算在内，总数多达200种左右。无论在非通用语种数量还是在人才培养质量上，我国的外语类专业都严重滞后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当务之急，应加强顶层规划，鼓励高校“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尽快开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以及关键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使高校非通用语专业教育迈上新台阶。

1.3.4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攻坚、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点。《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全面阐述了振兴本科教育的基本原则：1）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2）坚持学生中心，全面发展；3）坚持服务需求，成效导向；4）坚持完善机制，持续改进；5）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可见，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运用系统思维，采取综合、协同、持续的措施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上述五项原则为诊断外语类专

业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提供了系统思考的坐标。

其一，坚持立德树人。当前外语类专业应着力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由于外语类专业所特有的教学内容大量涉及外国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如何通过课程教学有效塑造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尤为重要和迫切。

其二，坚持学生中心。外语类专业应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从“教得好”向“学得好”转变。教学活动应围绕学生的积极学习展开；教学过程应成为师生合作探究和建构知识的过程；教学目标应超越纯粹的语言技能训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坚持学生中心还意味着外语类专业应超越以就业为唯一目标的极端功利化办学导向，重视人文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发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其三，坚持服务需求。外语类专业应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定期研判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本专业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需求，并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积极调整办学定位，不断完善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适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当然，外语类专业作为人文学科，其服务经济社会需求的功能不应被狭义理解，最终使其降格为职业外语培训；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类专业人才素质、知识和能力提出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充分发掘本专业的学科资源和潜力，加强本专业的“学科性”（曲卫国、陈流芳 2018），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本专业独特竞争优势的合格外语类专业人才。

其四，坚持完善机制。人才培养质量的最终保障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机制，主要包括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质量评价保障机制等。外语类专业和高校许多其他专业一样，尚未建立系统的持续改进机制，如培养方案与教学内容不能根据经济社会需求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反馈进行及时修订，教学评估的结果不能及时反馈以促进教学改进，课外答疑解惑机制普遍缺失，等等。外语类专业下一阶段的改革应致力于将建设“质量文化”内化为全体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其五，坚持分类指导。关于外语类专业的多元化特色发展，上文已经讨论，此不赘述。外语界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是：外语类专业相较于其他类专业应坚守的专业“本色”是什么？外语类专业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外语类专业如何平衡好“本色”

和“特色”的关系？我们认为，外语类专业“有必要也有可能追求多元性的同时并不丧失统一性，而在追求统一性的同时也不牺牲多元性”（孙有中 2014）。

最后，教师始终是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关键要素。相较于高校其他类专业，外语类专业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按照《国标》对生师比的要求，外语类专业的教师数量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短缺。同样迫切的问题是外语类专业教师的博士学位比例和高级职称比例相对不足，拥有专业知识和学科训练背景的教师比例相对不足，师资队伍在数量和素质两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最终必须依靠一大批教研相长、教研双优的学者型优秀教师。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前司长张大良（2018）指出的，“要把高水平教学与科研作为青年教师专业素养考核的基本要求，增强教师的科研活力和教学定力，促进教师开展研究型教学，应用好新形态教材，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为此，外语类专业广大教师队伍应超越“外语教师”的传统身份定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语类专业教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本领，包括职业道德、教学能力、研究能力和学科知识。外语界应超越从国外移植的外语教师能力框架体系，探索外语类专业教师的研究能力构成与发展路径以及学科知识结构的搭建，在理论上构建适应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的能力框架。在实践层面，高校外语类专业应重新认识外语类专业教师的身份与发展定位，创新教师发展的内容与形式，重构教师学科知识，提升教师研究能力。在教学能力方面，外语类专业要引导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积极探索语言与学科知识融合教学、跨文化外语教学和思辨外语教学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孙有中、张虹、张莲 2018）。

新时代的中国正大踏步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参与和引领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和依靠数以千万计的国际化高端各语种专业外语人才，以及全体公民的国际素养。可以说，外语类专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外语界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外语类专业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丁超. 对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类专业建设现状的观察分析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7 (4): 3-8.
- [2] 丁超. 关于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变革与创新的若干思考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8 (1): 3-9.
- [3] 范海林.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 将推三级专业认证振兴本科 [N/O]. 光明网, 2018-12-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603776653523027&wfr=spider&for=pc>
- [4] 国纪平. “一带一路”倡议 5 周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A]. 人民日报, 2018-10-6.
- [5] 胡文仲. 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 [A]. 胡文仲. 胡文仲选集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140-156.
- [6] 胡咏梅、唐一鹏. “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和财政投资规模预测 [J]. 重庆高教研究, 2019 (1): 10-22.
- [7] 姜锋. 外语类高校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N]. 人民日报, 2018-01-04.
- [8] 蒋洪新. 关于新时代英语教育的几点思考 [J]. 外语教学, 2018 (2): 50-51.
- [9] 刘宏、孙玉华. 新时代《国标》实施与俄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面临的新方向和新任务 [J]. 中国俄语教学, 2018 (3): 69-72.
- [10] 曲卫国、陈流芳. 治疗英语本科专业“毛病”急需厘清的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 (6): 16-18+24.
- [11] 麦可思研究院. 2018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12] 孙有中. 英语教育十大关系——英语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本原则初探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4 (1): 3-10.
- [13] 孙有中、张虹、张莲. 《国标》视野下外语类专业教师能力框架 [J]. 中国外语, 2018 (2): 4-11.
- [14] 王立非、崔璨. 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向外语产业人才培养的转变 [J]. 语言教育, 2018 (3): 2-6.

- [15] 王铭玉. “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战略构建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7 (1): 3-7.
- [16] 吴岩. 一流本科, 一流专业, 一流人才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 (11): 4-12+17.
- [17] 查明建. 英语专业的困境与出路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 (6): 10-15.
- [18] 张大良. 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N/O]. 人民网, 2018-10-26. <http://edu.people.com.cn/n1/2018/1026/c367001-30365545.html>
- [19] 郑书九、刘元祺、王萌萌. 全国高等院校西班牙语专业本科课程研究: 现状与改革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 (4): 574-582.
- [20] 周媛. 我国高校日语教育同质化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4 (12): 上旬刊.

2. 专业定位

高等学校的专业定位包括两个维度，即专业内涵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前者关系到专业的性质，后者关系到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事关专业点的生存与发展。就外语类专业而言，专业定位就是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外语类专业的性质是什么？2) 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基础是什么？有什么特点？3) 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是什么？有哪些培养取向？4) 外语类专业点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办学定位？以下我们将以《国标》为依据，在简要分析新时代外语类专业定位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全面阐述外语类专业定位并回答以上问题。

2.1 新时代外语类专业定位的必要性

关于外语类专业定位的必要性有很多论述（张冲 2003；戴炜栋、张雪梅 2007；丁超 2017）。近些年，外语类专业饱受质疑，就与定位模糊不清有很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外语类专业要健康发展，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找准自己的定位。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时代要求。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外语类专业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步。成立初期，为打破西方封锁，学习苏联在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外语类专业重点培养从事外事外交和科技翻译等工作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为促进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外语类专业重点培养能用外语进行外事活动、文化交流、商贸洽谈、技术引进的技能型人才；21 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以及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外语类专业着重培养会外语、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外语类专业需要为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为文明互鉴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持。

第二，高等教育现状和外语类专业的实际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阶

段，大学不仅要培养从事学术研究、科技创新或参与社会治理的人才，而且要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面对高等教育现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2010）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分类发展，高等学校要合理定位。外语类有一百多个专业，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学生的外语基础参差不齐，专业点分布高校众多，办学水平相去甚远。面对这一实际，外语类专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找准自己的定位。

2.2 存在的问题

《国标》出台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外语类专业建设主要是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指导下展开。在必须打破“纯语言、纯文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目的驱使下，在“从根本上来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的思想指导下，外语类专业在新世纪初正式走上“复合”之路，全面推行“外语技能 + 专业知识 + 相关专业知识”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专业性质模糊。专业以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但人才培养离不开学科内涵。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2）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内涵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属于文学门类。“外语技能 + 专业知识 + 相关专业知识”模式模糊了这一属性。具体表现在：1）将“外语类专业”中的“外语”理解为外语技能，让人从名称上将外语类专业判断为培养外语语言技能的专业，甚至认为它只有“专业”之名，无“专业”之实（蔡基刚 2012，2019）；2）外语技能课程唱主角，专业学科内容被边缘化；3）外语技能训练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将外语类专业教育稀释为外语技能训练（孙有中 2014）；4）学生的专业能力测评以外语技能和外语知识考查为主。总之，外语类专业长期存在重语言技能轻专业学科内涵的倾向，未能严格按照专业教育要求和专业学科内涵来建设（查明建 2018）。不可否认，外语类专业涉及外语能力和专业知识两个核心要素，但外语类专业学习不等于

外语学习，外语类专业教育不等于外语教学。外语技能培养只是外语类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良好的人文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突出的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才应是外语类专业教育的着力点。对此，不少外语教育专家呼吁，外语类专业应确立外国文学、语言学和相关国家研究的学科主导地位，然后积极向人文社会学科的相关领域拓展（胡文仲、孙有中 2006）。

第二，学科内涵越位。“外语技能 + 专业知识 + 相关专业知识”模式强调外语与其他专业的复合，初衷是适应市场需求，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竞争力。受此目标驱使，各专业点一方面不断创新复合模式，“主辅修”“双专业”和“双学位”模式纷纷登场，另一方面在“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上做文章，“相关专业”不断拓展，“外语 + 经贸”“外语 + 外交”“外语 + 管理”“外语 + 新闻”“外语 + 教育”“外语 + 科技”“外语 + 法律”“外语 + 金融”“外语 + 会计”“外语 + 工程”“外语 + 中医”和“外语 + 体育”等等，层出不穷。这样的简单加载进一步强化了外语的工具性质和外语类专业就是“外语技能 + 相关专业知识”的认识。课程设置上，语言技能课程唱主角，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紧随其后，专业学科知识课程被边缘化，导致学生的知识架构出现“走样”和“变形”。从培养效果看，毕业生的专业学科知识不足，相关专业学科知识也只是皮毛，既没有实现复合型培养的初衷，也未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查明建 2017）。

第三，通识教育缺位。根据《教育大辞典（第3卷）》（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1991），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及某一学科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实践创新能力教育。然而，“外语技能 + 专业知识 + 相关专业知识”模式突出外语技能的基础地位，强调相关学科的重要性，却让外语类专业缺少了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通识教育。其实，外语类专业有良好的通识教育传统。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后来更是以造就通才为根本宗旨（球鑫奎、唐良炎 2007）。后来，外文系学生要修读国文、中西通史、逻辑学、哲学概论、伦理学，并选修自然科学课程。一段时间以来，受实用主义和技能优先思想影响，看似“无用”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外语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慢慢失去了踪影。近年来外语类专业的通识教育受到广泛关注（如蒋洪新 2004；孙有中 2008；王鲁男 2013），一些高校已开始探索，并根据不同的培养方向开设了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通识教育出现回归迹象。

第四，人才培养同质化。近些年人们对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批评很多，比如毕业生的人文素养不高、专业知识深度不够、思辨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最为集中的是人才同质化问题。人才同质化是由培养模式的单一性造成的。首先，在“复合型”定位指导下，各外语语种专业都以培养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能熟练运用外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为目标，忽视各语种在使用范围、社会需求以及学生外语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其次，各专业点办学定位模糊，办学目标整齐划一：或依据同一份大纲组织教学，按照统一模式培养人才（胡文仲 2014；孙有中 2019）；或随波逐流，跟着“好学校”走，导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选择趋同。最后，由英语专业发展而来的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与英语专业之间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等各个方面交叉重叠，有名不副实之嫌（孙有中 2019）。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普通人才过剩，高层次人才短缺。

2.3 新时代外语类专业定位

为了满足新时代国家全球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针对外语类专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国标》对外语类专业的内涵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2.3.1 专业内涵定位

专业内涵定位明确专业属性和学科基础。根据《教育大辞典（第3卷）》，学科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与知识相联系。那么，外语类专业的性质和学科基础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外语类专业是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外语类专业可与其他相关专业结合，形成复合型专业。

这是《国标》对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内涵定位，它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学科基础是外国语言文学，人文性质突出，跨学科特点明显；外语类专业可以与其他相关

专业结合形成复合型专业，开放性很强。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外语类专业从未缺席，但是对其性质的关注和讨论却主要出现在新世纪之后，集中体现为“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人文论者认为，外语类专业是以某一门外语为媒介，以文、史、哲为基本学习和研究内容的典型人文性专业，应该以人文教育为主脉，朝着人文学科的方向去建设（王守仁 2001；张冲 2003；封一函 2019；顾悦 2019）。人文性质决定外语类专业要致力于培养掌握专业知识（主要是语言、文学、文化知识）的通识、通用型人才。工具论者认为，语言就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思想与情感、传承文化的工具，外语类专业的根本目标就是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并利用它（们）来进行跨语言的信息沟通和思想、情感、文化交流，外语类专业应该培养掌握这一工具并能用它来进行（或协助他人进行）信息沟通、情感传递和思想交流的人才（蔡基刚 2019）。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与很多专业不同，外语类专业涉及语言和专业知识两个要素。人们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性质和内涵认识比较统一，但对“外语类专业”中“外语”的解读存在差异，导致对外语类专业的理解莫衷一是。毋庸置疑，语言是获取和传递信息、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是各类知识的载体，媒介和载体都是工具性的体现。但是，“外语类专业”中的“外语”就是指作为媒介和载体的某一外国语言吗？

“外语类专业”的全称是“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外语”是“外国语言文学”的简称。换句话说，外语类专业以“外语”为名，以外国语言文学为实，“外”是国别概念，使其区别于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语言”指某一门外语的语音、结构、意义和语用知识以及它们在词汇、句子、语篇等各层面上的表现，“文学”指某一语言群体创造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知识。“语言”和“文学”虽各有所指，但相互交织，难以分割：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是外语类专业的核心学科内涵，离开这两个内涵，外语类专业便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但是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并不局限于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而是自然延伸到“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之所以是自然延伸，是因为虽然这些学科的内容与外国语言学 and 外国文学存在差异，交叉性和跨学科特点明显，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涉外”特点：翻译学是关于语言转换的学问，探究不同语言（尤其是母语与外语）之间相互转换的规律；国别与区域研究是“睁眼看世界”的学问，致力于认识和探究国（域）外世界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政治、

经济状况；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关注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文化与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学习和研究这些学问都离不开外语这一基础，翻译学如此，国别与区域研究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亦然，因为通过译文去审视外面的世界、理解和欣赏他国的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见，外语类专业姓“外”，但对姓“中”的相关内容（如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中国社会、中国思想）不但毫不拒斥，而是要“揽入怀中”，让它们与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和外国思想形成关照。明确了外语类专业的内涵，在实际培养过程中，无论是重文学、轻语言，还是重语言、轻文学，只要不是语言技能培养唱主角或相关专业知识喧宾夺主，专业性质就不会改变，“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就成了伪命题，外语与外语类专业、外语教学与外语专业教育、外语课程与外语类专业课程之间的界限也就清晰起来了。

无论是关于语言的知识还是关于文学的学问都是典型的人文学科，这便决定了外语类专业的人文底色。但是，由于专业学科基础已经从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延伸到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国标》将外语类专业界定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外语类专业以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为核心学科内涵的传统，也体现外语类专业积极与其他专业融合的现实。传统上，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国的国立大学，外语类专业都归属文学门类；新中国成立至今，尽管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不断调整，外语类专业在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主要环节始终属于文学类别。从现实来看，外语类专业在经过与其他一些专业的融合实践后，已形成商务英语等独立的复合型专业。《国标》明确指出，“外语类专业可与其他相关专业结合，形成复合型专业”，这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也有利于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复合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对“复合”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专业性质。“复合”不是一门外语与某一专业的简单加载，而是某一外语语种专业（如英语专业、阿拉伯语专业）与另一个专业的合理融合。

“复合”的主体是外语类专业，“复合”的前提是夯实外语类专业的根基。学生必须首先在外国语言文学领域接受扎扎实实的专业教育，具备本专业规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复合”，才能根深叶茂，行稳致远。

正确把握“复合”这个概念是理解外语类专业的开放性，进而回答外语类专业能与哪些专业复合的前提。具体回答这个问题，需以“新文科”思想为指导，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导向。“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战略性、创新性和融合性三个

方面（王铭玉、张涛 2019）。因此，在考虑外语类专业应向哪些专业开放时，要有战略眼光，把国家战略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创新融合为驱动，突破人文社会科学疆界，尝试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实现培养模式和学术研究创新。从人才需要看，当前外语类专业可以与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与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商务、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专业复合，培养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和满足涉外行业需求的人才；与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法、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复合，培养参与国际对话与协商、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增进多元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的人才。从学术研究需要看，外语类专业除了进一步加强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融通，寻求理论突破以外，还要加强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专业的融合，开展政治话语研究，促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与脑（认知）科学和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融合，探索语言与人脑、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工程类专业融合，探索语言研究、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新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

2.3.2 人才培养定位

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2010），人才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素质和能力是构成人才的三个基本要素。

外语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员和复合型外语人才。

这是《国标》对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定位，涉及素质、知识和能力三方面的要求和人才培养取向。人才培养取向是多元的，体现在培养类型和培养面向两个方面。具体来讲，外语类专业面向国家或地方培养对外交流、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域所需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员和复合型外语人才。换句话说，外语类专业人才包括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以下简称“外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

才两种类型。多元取向既符合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和外语类专业规模庞大的现状，也是社会和高校对外语类专业的共同期待。那么，《国标》对外语人才在素质、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

这是《国标》对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分为普遍性要求和区别性要求两个层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良好道德品质是对每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普遍性要求，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是对外语类专业毕业生的区别性要求，分别体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普遍性和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体现专业特色。

这是《国标》对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基本知识要求，包括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两个方面。知识结构符合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内涵，掌握要求体现所涉知识在培养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属于外语类专业的核心内涵，必须“掌握”；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与专业核心内涵相互关照，应该“熟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知识与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知识结构搭建有关，需要“了解”。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这是《国标》对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基本能力要求。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是外语类专业人才的本色与核心竞争力，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外语类专业人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外语运用能力不能狭隘理解为外语语言技能，而主要指信

息、观点、情感的表达、理解与传递能力以及运用语言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有效分析和解释的能力。

以上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构成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基本品质。它表明：1) 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能力要求缺一不可；2) 仅仅拥有外语语言技能，无论外语讲得多么标准，口头表达多么流利，文字表达多么优美，外语基础知识多么丰富，如果素养不高，文学赏析能力欠缺，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不足，创新能力、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缺失，都不是合格的外语类专业人才。

外语专业人才与复合型外语人才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良好的素质、突出的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丰富的外国语言文学知识是他们的共性，差异主要体现在知识结构以及通过培养形成的能力两个方面：外语专业人才专注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和对象国文化知识，在翻译、外语教育和语言服务相关领域有专攻，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思维与能力；复合型外语人才除了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以外，还应具备足够的相关专业知识、合理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跨学科思维与能力。

2.3.3 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就是确定人才培养类型、人才培养面向和人才培养层次。

各高校应根据自身办学实际和人才培养定位，参照上述要求，制定合理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应保持相对稳定，但同时应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这是《国标》给办学定位提出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办学定位要立足学校实际，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学校实际主要指专业点所在学校的办学层次、办学传统、办学资源、生源质量和办学地域等，其中办学层次往往与办学资源（教师队伍、教学条件和办学经费）和生源质量有关。办学层次，主要有按照管理归口划分的“国家队”和“地方队”高校，以及按照建设目标划分的“双一流”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办学传统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和专业特色院校。这些实际情况会对人才培养类型、人才培养面向和人才培养层次的选择产生影响。或者是面向国家战略需

求，致力于培养有使命担当的高层次人才；或者以满足地方或区域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为主导，以培养各类普通外语类专业人才为主要任务，同时为部分素质优良的学生将来成为高层次人才铺设通道。专业特色高校（如师范类、理工类、政法类、财经类、外语类）要依据学校办学层次、办学传统和招生人数确定人才培养类型和层次。比如，师范类院校要着重培养不同层次的外语教育人才；理工、政法和财经类院校要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培养体现学校特色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语类院校招生人数较多，要根据学校实际，培养多类型、多层次的外语类专业人才。

本章以《国标》为依据，深入阐释了外语类专业的内涵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内涵关系到专业的性质，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固步自封。外语类专业属于文科专业，以外国语言文学知识为基本内涵，相关学科知识为外延，人文性质突出，跨学科特点明显，开放性强。外语类专业培养外语专业人员和复合型外语人才，良好的人文素养、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突出的外语运用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办学定位关系到专业点的生存与发展，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盲目跟风，要立足学校实际，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办学定位是专业点的行动指南，一旦确定就不必羡慕他人的位置，只需在自己的定位上争创一流。

参考文献

- [1] 蔡基刚. 大学英语教学转型时期的我国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改革 [J]. 中国外语, 2012 (1): 10-15.
- [2] 蔡基刚. 外语教育政策的冲突: 复合型人才还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 1-6.
- [3] 戴炜栋、张雪梅. 对我国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反思 [J]. 外语界, 2007 (4): 2-11.
- [4] 丁超. 对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类专业建设现状的观察分析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7 (4): 3-8.
- [5] 封一函. 新时代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内涵 [J]. 中国外语, 2019 (4): 16-21.
- [6]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

- 若干意见 [Z]. 教育部高教司, 1998.
- [7] 顾悦. 回归人文学科: 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 (1): 16-21.
- [8]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9]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10] 胡文仲. 试论我国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 回顾与展望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1): 111-117.
- [11] 胡文仲、孙有中. 突出学科特点, 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8 (5): 243-247.
- [12] 蒋洪新. 大学的“通识教育”与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6): 144-148.
- [13]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教育大辞典 (第3卷) [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14] 球鑫奎、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5] 孙有中. 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8.
- [16] 孙有中. 英语教育十大关系——英语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本原则初探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4 (1): 3-10.
- [17] 孙有中. 落实《国标》要求, 大力提高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能力 [J]. 中国外语, 2019 (5): 36-42.
- [18] 王鲁男. 外语专业通识教育: 历史、现状与展望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6): 922-932.
- [19] 王铭玉、张涛. 高校“新文科”建设: 概念与行动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3-21.
- [20] 王守仁. 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2): 42-43.
- [21] 查明建.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的意义——以《国标》人文课程为

中心 [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17 (1): 18-25.

[22] 查明建. 英语专业的困境与出路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 (6): 10-15.

[23] 张冲. 关于英语专业定位的思考 [J]. 外语界, 2003 (4): 7-13.

[24]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